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成果丛书

童 兵 / 主编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

最新报告 (2010)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成果丛书

童 兵 / 主编

林溪声 楚亚杰 方师师 / 副主编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 最新报告 (2010)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10) / 童兵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9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成果丛书)

ISBN 978-7-309-07517-5

I. 中… II. 童… III. 新闻学:传播学—研究报告—中国—2009 IV. 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0624 号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10)

童兵 主编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姜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1240 1/16 印张 29.5 字数 694 千

201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517-5/G·913

定价: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在2010年度最新报告即将付梓之际,像往年一样,有必要重申编撰本报告的宗旨:向人们鸟瞰式地展示过去一年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科科学研究的全貌,包括这一年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主要研究领域、重要学术论文及观点,重要学术会议和公开出版的著作与教材。同时,作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简称“985”国家创新基地)的主要学术成果之一,这部报告也是向国家和复旦大学“985”管理机构提交的一份报告。

从2006年编撰第一部最新报告以来,本报告是第五部,报告2009年全年新闻传播学科科学研究的情况与成果,以中国高校学者的成果为主。2009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学研究聚焦于下列三个热点:

一是探讨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重要成就和新闻传播学科学研究的基本经验。

二是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新闻报道的特点和走势。

三是媒体融合语境下中国新闻传播改革的方向与重点。

本报告编撰者对过去一年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检索的领域大致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的两个二级学科即新闻学与传播学,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广播电视,以及目前专业目录中归于传播学名下的广告、公共关系、图书编辑出版和媒介经营管理。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参与本年度报告编撰工作的近40位2009级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他们以自己的学术素养、敏锐眼光和勤奋努力,在几百种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中进行“地毯式”梳理,比较全面地检索相关议题的论文。有的博士研究生根据主题检索的需要,还在一些鲜为人知的刊物中发现了有意义的相关论文及观点。因此,读者们会在今年的最新报告中发现一些新的刊物和新的议题。比如,本报告将新闻摄影作为新闻学下的新议题,单成一节。舆论学下增加了调研研究的议题。出版学中加入了书展的内容。网络研究中增加了商业网站的专节。广播电视下增加了非营利性电视台的个案研究。文化产业的内容也有所增加。之所以有这样的增量,有的是年轻的研究人员对这些内容有兴趣,且有一定数量的研究对象。有的作者是某个非营利电视台的负责人,有的作者则是某个知名商业网站的负责人,他们在这方面有丰富的业界经验,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接触新闻传播专业知识后,学术火花迸发,于是有了这样的选题和作品。作为主编,我自然是支持他们的这种开拓精神的。

本年度报告关于新闻传播史部分的梳理与分析不理想。按理说2009年是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60年大发展的庆典与总结之年,新闻史的研究也不该例外。但读者能够发现,报告在这方面的内容有欠缺,中国新闻传播史梳理得不充分,尽管请他人做了修改,我本人也动手匡正,终未能向读者贡献更为成熟的作品。外国新闻传播史在历年研究状况上花的笔墨过多,本年度内容则聚焦不够。这些遗

憾,作为主编,我是有责任的。

纵观过去一年的研究成果,阅读和修改报告初稿,深切感到新闻传播学科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一如既往,依然未能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更少见切实解决这些问题的足够的努力。这些问题主要是:基础性研究下工夫不够,缺乏标志性成果;对策性研究深度不够,缺少理论性成果;研究力量过于分散,研究领域过于庞杂,“打快拳”的短期行为过于普遍,这些现象必须引起学界高度重视。

本年度报告学术会议和学术著作部分仍延请张晓锋博士编撰,他从第一部开始就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当时还在我院攻读博士学位。去年他在台湾世新大学访学,我去电征询意见,他答应继续“挑重担”,并说已经动手。返回大陆后,又开始担任副院长,但他仍是第一位交初稿的作者。

这里不能不提到本年度报告副主编楚亚杰同学,她是这部最新报告最年轻的副主编。作为2009级博士班的班长,她协助我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初稿整理大部分由她主持完成,其间她的同学方师师主动请缨,参与部分初稿修改。我在修改初稿时杂事缠身,博士后研究人员林溪声博士协助我阅读、修改了部分初稿,完成了摘要英译稿等编务琐事。

我注意到教育部社科司张东刚副司长多次在有关会议上提到我们的这部最新报告。出版社也几次反馈读者对报告的良好反响。这令我对编撰好这部报告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期待我和我的年轻的团队今后能向学界和读者提供更具学术含量的最新报告,我们将为之而坚持不懈地努力。

为保证报告编撰的质量,根据教育部社科司的要求,总报告今年继续拜请丁淦林、丁柏铨两位老教授审读批评。两位专家在肯定报告优点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根据他们的意见,已作了必要的修改。

多年来,我所在的“985”创新基地和新闻学院为本报告的问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经费和物质支持。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始终对于本报告的编撰出版给予关怀。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圣遂社长和章永宏、姜华等编辑为本报告的按时和有质量的出版提供各种方便条件。这使我和我的团队深受感动。

向上面提到的各位领导、专家、责编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谢忱。向参加本年度报告编撰工作的全体作者团队在研究编撰工作中的科学态度、发现能力、认真严谨的学风,以及相互间协作支援精神,再道一声谢谢。

在这部报告付梓之际,作为主编的我仍惴惴不安。还是那句每年必说的老话:由于期刊太多,论文太多,作者太多,仍不免会疏漏少数学者的重要论文,对论文观点的提炼也可能不尽精当,对一些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及教材可能检索不全面。报告对目前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许找得不准而有失偏颇。所有这一切,作为主编,我应承担主要责任,欢迎广大读者尤其是相关学者、专家批评指正。

童兵

2010年5月21日

于复旦大学“985”创新基地

目 录

前言	童 兵 1
----	-------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2010)	2
---------------------	---

第二部分 新 闻 学 研 究

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	34
中国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研究	49
外国新闻事业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59
新闻实务研究	78
新闻摄影研究	93
新闻政策与新闻法规研究	103
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研究	117
突发公共事件与群体性事件新闻报道研究	130
舆论学与社情民意调查研究	144
舆论监督与新闻批评研究	157
新闻教育研究	168
比较新闻学研究	180

第三部分 传 播 学 研 究

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	194
受众研究	206
传播效果研究	220
新媒体理论与实务研究	229
中国商业网站现状研究	256
广告研究	264
公共关系研究	276
社会风险与危机传播研究	286
跨文化传播与对外宣传研究	299
媒介文化研究	311

第四部分 广播电视研究

广播研究	324
电视研究	333
广播电视节目形态研究	344
广播电视主持人研究	353
广播电视文艺研究	362

第五部分 传媒经济管理与体制改革研究

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	376
媒介经营管理研究	387
传媒体制改革研究	396
文化产业研究	408
研究个案:非营利性电视台营销经营策略研究 ——以公益组织经营之台湾卫星电视台为例	423

第六部分 图书编辑出版研究

图书编辑理论与实务研究	436
图书出版理论与实务研究	445
出版产业研究	460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2010)

2009年中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聚焦于三个热点:

一是结合梳理新中国60年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经验,总结分析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成绩与不足。

二是讨论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新闻报道的特点与走势,重点研究风险社会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

三是随着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深化,探讨新闻传播改革的新路径和新特点。

在上面三个研究热点的带动下,其他方面的研究同前一年一样,有了全面的展开与提升。

一、学术研究聚焦的热点

1. 新闻传播学基础研究的经验与不足

2009年,中国高校研究人员站在新中国建立60周年的基点上,对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和新闻传播学研究进行全面梳理,探讨新闻传播学基础研究的核心内容及基本经验。

有研究者指出,新中国成立60年,新闻传播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新闻传媒业这种跨越式的超常规发展的基本经验是: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是传媒业发展的两大基础性因素。没有改革与开放,中国传媒业不仅难以发展,也不可能走出国门;没有科学技术新成果的支持,中国传媒业也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同全球一起共同前进。这是中国传媒业6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①。有学者认为,60年来对新闻事业属性的认知,即从“驯服工具”到“以人为本”的认知历程,反映出四个方面的进步:对人的尊重和对人全面发展的重视,对科学的尊重和对新闻传播规律的重视,对人权的尊重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自觉的回归,经济振兴对新闻传播事业的推动^②。

有研究者从基本经验、存在问题、未来展望三个方面对中国高校学术发展进行理论思考,认为基本经验有五条:中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坚强支持,解放思想放大胆子走稳路子,打开国门礼贤海外学子,抓紧基础性研究兼顾应用性研究,切实改进研究方法^③。另一位研究者则认为新闻学六十年发展有六点经验:第一,新闻学研究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第二,新闻学研究须坚持服务新闻实践、传媒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方向。第三,新闻学研究须不断破除“新闻无学论”的影响。第四,新闻学研究须不断排除“左”和右的干扰。第五,新闻学研究须遵循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第六,新闻学研究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④。

有学者以1978年为分界,对比新中国前后30年新闻业的巨大差异,认为后30年中国新闻业发展意义深远、成果显著。前后30年中国新闻业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是从前30年的宣传本位转向后30年

① 参见童兵:《依托改革与科技的双翼腾飞 中国传媒业六十年发展的基本经验》,《传媒》2009年第10期。

② 参见童兵:《试析新闻事业人民属性六十年认知历程》,《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9期。

③ 参见童兵:《中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三十年理论回顾与展望》,《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④ 参见郑保卫:《新中国60年:新闻学研究发展经验思考》,《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11期。

的新闻本位的结果。正是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推动了其他一系列的变化^①。也有学者认为,60年来中国传媒经历了从“阶级斗争工具”——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文化产业这样的性质变化,而这一变化随之带来了新闻报道方式的一系列变动^②。

有研究者对新闻传播学的变动及规律进行讨论。他们指出,第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演变,可以通过“范式”作为分析工具加以把握。第二,这种演变,与社会的转型和变迁关联密切。第三,这种演变,常常伴随着新闻传播学研究对象——媒介的变化而不断推进。第四,这种演变,以研究主体的代际与结构关系作为考察的重要视角^③。学者们还指出,新闻学研究这些年经历了从拥有实务资本到拥有学术资本的变化,学术积累不断增加,学术意识得以张扬,研究方法也从单一的思辨研究变得多样化。建构学科体系,推进新闻改革是研究的最重要成果^④。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最核心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突出的优点是适时更新观念,最鲜明的特征是强调实践品格,最强烈的印象是立足时代前列^⑤。

有学者统计了近30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论争文献,发现学术论争的主题是与时俱进的。在30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凸显过三个数量上的高峰,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传统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集中发表在少数的核心期刊,但是已显示出向其他方面渗透扩散的时代趋势。这样的学术论争颇具启示意义:一是形成集体记忆和学术传承积淀,二是形成学术生态的多样化,促进学术健康发展^⑥。

有学者从学术规范角度研究了新闻学学术规范的依据和路径,认为新闻学学术规范存在的现实依据是学术失范现象的客观存在,关于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研究还比较零散和肤浅,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这种现状迫切要求在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不断深入,能够透彻地研究学术规范体系的内容和机制,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体系,并且通过完善的学术规范管理和保障制度,提高新闻学研究的规范性,提升新闻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以促进新闻学学科的整体建设与发展^⑦。

2. 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新闻报道的特点与走势

人们都说2008年是个“多事之秋”,突发公共事件不断。2009年继续呈现这种态势,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依然接二连三发生。有学者称2008年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是“灾难性报道的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少见的突发事件现场记者群体大规模云集;从未有过的多媒体联合作战显现多视角、立体式报道;贯穿整个报道中的人性化报道理念^⑧。在2009年中,学者们从前一年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出发,进一步对中国政府及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信息控制、新闻报道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进行回顾与分析,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日报社等就有及时公开报道突发事件以及如实公布死难者数字及名单、身份等人性化做法。但这只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个别媒体的一时突破,难敌多年来传媒报喜不报忧、将突发事故当作英雄故事来报道的扭曲习惯,总是在反复中回归到相对保守的

① 参见李良荣:《艰难的转身: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共和国60年新闻媒体》,《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9期。

② 参见陈力丹:《新中国60年:关于传媒性质的认识及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10期。

③ 参见谢鼎新:《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④ 参见张振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透视》,《南昌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⑤ 参见尹韵公:《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

⑥ 参见邵培仁、廖卫民:《中国新闻传播学30年学术论争的文献统计分析》,《当代传播》2009年第1期。

⑦ 参见郑保卫、郭平:《试论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的依据与路径》,《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6期。

⑧ 参见范以锦:《2008年重大传媒事件》,《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1期。

思维轨道^①。

有学者将60年来新中国应对突发事件的政策法规、新闻报道和编辑理念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强调用正面手法处理灾难新闻，舆论一律，对负面情况不作具体报道。二是从1978年至2003年，政府开始为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建章立制，但“宁慢勿抢，准确至上”的要求和严格审查，使得突发公共事件报道难得保证时效性。以2003年“非典”事件报道为转机，是第三个阶段，信息公开的加速立法和中央部委及地方政府全面推广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及《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我国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和编辑理念完成了由“官本位”向“事本位”、由“时宜性”向“时效性”、由“模式化”向“多样化”的三大转变^②。

有学者指出，从重大公共事务及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反思，当前政府公共事务传播模式已面临重构，以便提高其信息传播效率和政府公信力。信息传递在突发事件中起着“稳压器”、“协调器”、“推动器”的作用，及时的信息传递对突发事件的化解处置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功能。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第一时间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事情及政府有何对策，是政府保障公民知情权的职责所在。在信息传递上，报比不报好，早报比晚报好，自己报比别人报好，主动报比被动报好，不应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瞒报^③。还有学者指出，“公众意识觉醒的时代”已经来临，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只会做、不会说”者，往往是伤痕累累、举步维艰。恐慌止于信息公开，谣言止于信息畅通^④。有学者主张，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突发事件，政府不仅要讲真话，主动澄清事实，提供合理建议，而且政府的消息还应“跑”到谣言前面，才能争取到主动权，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⑤。

有学者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对于突发事件中出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普遍不适应，往往判断与处置失当。对网络舆情判断的能力已经成为政府应对处置突发事件能力的重要标志。基于群体性事件同网络舆情的紧密联系，强化网络媒介管理，加强网络舆情疏导成了当务之急。为了有效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政府应从思想上重视网络舆情，完善网络立法，加强网民的伦理道德教育。在当前，要下大力气构建突发事件省市级舆情监报机制^⑥。

有学者提出，政府必须拥有科学的媒体应对策略，高处入手，化解危机，塑造形象，消除影响。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的媒体应对策略和技巧，关乎政府形象和公共危机的化解。因此，学者建议政府牢牢掌握信息源，具备驾驭焦点的公关技巧，让对自己有利的议题成为整个过程中民众关心的议题。他们还指出，突发公共事件中展现出新闻媒体的生存环境，考验着传媒的社会价值观念。近30年来，媒体逐渐从原先那种内嵌于政治系统的“齿轮”和“螺丝钉”，转向具有相对发展权利的空间。媒体如何与政府在良性互动中共同应对突发事件，在传媒运作与舆论导向之间寻找平衡，变政治宣传为新闻传播，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⑦。

此外，不少学者还对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的业务特点、不同介质的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

① 参见陈力丹：《改革开放后第一起公开报道的突发事件》，《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1期。

② 参见张君昌：《60年来我国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政策法规及新闻报道和编辑理念演变》，《中国编辑》2009年第3期。

③ 参见张春明：《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传递与媒体应对》，《柴达木开发研究》2009年第3期。

④ 参见董关鹏、胡齐明：《遭遇突发事件如何面对媒体》，《现代班组》2009年第4期。

⑤ 参见石河子：《要和传言比速度》，《人民日报》2009年4月19日。

⑥ 参见朱勇钢、张永辉：《重大突发性事件舆情监报与群体性事件预防》，《成都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⑦ 参见孙旭培、胡素青：《舆论监督与社会共识》，《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道中的差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显示出随着突发公共事件与群体性事件作为风险社会的常态化,学者们的研究也有了相应的深化。

3. 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传播改革

在2009年,学者们对全球日益深化的媒介融合潮流给予了高度关注,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以文化产业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新闻出版改革在过去一年也有新的进展。在此语境下,新闻传播改革在一些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创新。这些都成为新的一年学术研究的重点。

学者们对于报纸未来的争论依然热烈,但报纸消亡论者似乎有所减少。有学者认为,传媒的外在形态不再是传媒间的本质差异。各种媒介的外在形态,都会有不同的人群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纸质传媒在未来的总体发展中,可能会呈现下降趋势,但不会消亡。对中国报业而言,更没有必要纠缠在报纸是否消亡的话题上。至少在中国,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踏踏实实地提高内容质量和服务水平,报纸仍然可以打造一个美好的明天^①。另一位学者认为,将来消亡的可能是大宗的新闻类报刊,以深度报道和时事评论为主要内容的少量报刊仍有市场。他提出应对网络挑战报业应采取的对策是:第一,报纸内容向深度化、思想化、知识化、娱乐化发展。第二,走小报化道路,改变版面,办好“小型大报”。第三,推出免费报纸。第四,以第二代互联网为目标建设视频新闻网站,力争办成有影响的网络媒体^②。还有一位学者预测未来报业发展趋势是:由单一纸介质向多介质并存的新媒体机构转变;由大众媒体向分众精准型媒体组合转变;由单向传播向互动传播转变;由新闻媒体向信息平台的功能转变;由“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向完全的“企业化管理”转变^③。

正是以这种共识为基础,学者们的工作大都指向媒介融合,认为这是现在和今后媒介发展的基本路径。他们认为,媒介融合的目的不是指某个报业集团拥有尽可能多的媒介类型,而是不同媒介类型间的嫁接、转化、融合,形成各媒介形态的核心价值,占有产业价值链的关键一环^④。有学者进一步明确提出,媒介融合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媒介化。媒介融合的提出标志着传媒业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一方面促使传媒业的内涵和外延重新界定,另一方面再次提升了传媒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⑤。

有学者分析当前媒介融合可能产生的利与弊。利者,媒介融合增加了媒介的经济价值和经济回报,因为它使得各种媒介分享规模经济的好处,分担企业风险,节约交易成本,使网民更加信任传统媒体创办的网站。弊者,易导致传播内容同质化,消解竞争力,并可能产生磨合风险^⑥。还有学者从另一视角分析媒介融合的利与弊。利者有:强大的信息检索功能,运用多种媒介形式全方位展示客观世界,政府、媒体、民众的即时互动功能,便携功能。而弊者有三:跨媒介集团造成媒介文化日益中心化和其他文化日益边缘化,整合媒介的构成形态导致媒介拟态环境无限扩大,人对媒介的依赖性大大增强从而导致“媒介人”的产生^⑦。

① 参见陈力丹:《报纸印刷版停刊不等于“报业消亡”》,《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1期。

② 参见刘建明:《重提报纸消亡的话题》,《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1期。

③ 参见周志懿:《思:报业未来趋势判断》,《传媒》2009年第1期。

④ 参见陈国权:《报业媒介融合的价值辨析》,《中国记者》2009年第5期。

⑤ 参见杨海军:《媒介融合:缘起与终极目标》,《传媒》2009年第4期。

⑥ 参见陈国权:《现阶段媒介融合易产生的负效应》,《中国记者》2009年第6期。

⑦ 参见孙海:《融合媒介的利弊之辩》,《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年第3期。

学者们认为,资源整合是媒介融合进程中的一道难题。这其中,一是内容同质化,二是媒介之间体制、文化、人员不相融,此外还有媒介规制和上层管理机构的阻力等^①。另一位学者指出,媒介融合中有四个关键变革需要认真思考:个体变革,在集体竞技中确定个人角色;体制变革,在新共同体中实现业务流程再造;产品变革,在集中化市场中推进个性化满足;媒体角色变革,在新产业链条上谋求新定位^②。

对于媒介融合的实现路径,有学者认为,媒介融合应该先进行传播渠道的融合,而后是传播内容和媒介功能的融合,最后是媒介组织机构的融合,而后的融合又可促使媒介内容、渠道、手段、功能、形态的进一步融合。媒介融合正是这样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③。

有学者借鉴美国媒介综合集团经营管理模式提出我国媒介融合下管理创新的几点建议:建立跨媒介集团的协同治理结构,实行资源共享和协同作战机制,采用扁平管理,实施跨媒介的新闻生产^④。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又值2009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广电总局进一步落实制播分离的改革举措,新闻改革在这一年得到深化,在深化过程中,学者们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有学者指出,新闻出版业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且改革的本质是企业化和市场化,为了配合改革需要按照市场运作的规律办事,淘汰机制需要同准入机制相配套;同时改制后新闻出版单位应当完全划归国资委系统进行更科学、更规范的专业监管^⑤。还有学者认为,30年来推动中国新闻生产关系变革的力量是资本,但是目前的新闻生产领域,资本的力量与传统社会的权力之间呈现的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政治利益主体”的一元化和“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中国媒体当下面临的主要矛盾。据此,这位学者指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转制,归根结底应该在身份、机制、产品三方面实行转变或转型^⑥。另有两位学者也认为,传统媒体的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实现两个目标:第一是保持新闻传媒队伍的稳定,第二是要有利于或有助于媒体实现根本化的市场转变,这其中包括打破政策壁垒、垄断经营和地域限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为人力资源的整合扫清障碍^⑦。

有学者指出对传媒规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中国传媒规制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目前存在条块分割、画地为牢、事业单位企业经营双重角色、权力者对传媒监管随意性、传媒规制缺乏规范性和透明性等问题。为此,中国传媒规制的改革方向要向制度设计、评价体系、法治体系、区域特色等方面入手,以尽快完善传媒规制体系^⑧。

学者们在过去一年里,对于党报改革给予较多关注。党报改革与党报创新的背景是基于新媒体冲击和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冲击,研究者在这个背景下关注党报的生存空间,提出许多创新策略,主

① 参见蔡雯:《资源整合:媒介融合进程中的一道难题》,《新闻记者》2009年第9期。

② 参见彭兰:《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青年记者》2009年第6期。

③ 参见黄建友:《论媒介融合的内涵及其演进路径》,《当代传播》2009年第5期。

④ 参见李红祥:《跨媒介经营:媒介融合下的传媒管理创新——以美国媒介综合集团管理经验为借鉴》,《新闻界》2009年第3期。

⑤ 参见曹鹏:《改制:新闻出版业如何过关?》,《新闻记者》2009年第3期;曹鹏:《从亲身实践看新闻出版业如何做好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新闻记者》2009年第7期。

⑥ 参见芮必峰:《试论资本在新闻生产关系变革中的作用》,《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7期。

⑦ 参见甘险峰、李旭:《推动传统媒体的体制改革》,《新闻战线》2009年第5期。

⑧ 参见喻国明、苏林森:《中国媒介规制的发展、问题及未来方向》,《山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张在技术、结构、内容、理念几个方面拓展,地方党报的创新是关注的重点。

有学者从社会阶层的演化与受众结构的变迁研究党报内容调整的理由。他认为,改革前的社会是一个分化程度较低、分化速度缓慢、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社会。因此受众结构单一,传播内容也单一。而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分化为十大阶层,党报优势影响区正在转型流失,而增量区尚属处女地。但党报自身转型却相对缓慢,跟不上时代步伐。因此,党报改革必须抓紧^①。有学者指出,党报面临新的挑战:新媒体、市场下滑、金融危机。这既是“危”又是“机”。他认为可以从理念、业务、经营上创新,转“危”为“机”^②。有学者提出党报创新要遵循五项原则,即:第一,党报的性质、任务和责任不能变。第二,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一致,不能对立,也不能偏废。第三,坚持政经大报风格,与晚报、都市报和其他平面媒体形成差异化。第四,应围绕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探索指导性 with 吸引力的有效统一。第五,在同级党委和主管部门领导支持下进行,同时也需要办报人的创造力和责任意识^③。

不少学者对2009年中央电视台以新闻联播为重点的电视新闻改革给予关注与评论。有学者指出,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地方台的强势崛起和肩负的使命责任是央视改版的动力。通过增加新闻条目、提高新闻评论频次等是此次新闻频道改版的核心。而收视份额明显提升、观众年龄趋向年轻化是改革的初步成果^④。也有学者对央视改革提出了新的期待:服务理念实现两个转变——从传达官方信息的服务员的转变和对宣传任务进行新闻化的转变;生产方式上实现全台共享的新闻频道的流程再造;评论维护上能够发出媒体自己的声音^⑤。

在思考、设计中国传媒改革中,一些学者注意到对国外传媒产业运作经验的借鉴。有学者对当代世界新闻业和中国新闻业的总体特征作了对比分析。他认为当代世界新闻业的一般特征是:资产所有制决定新闻传播的价值取向,市场手段维系媒体的经济命脉,传播技术提升及整合速度越来越快,新闻业与社会整体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而当代中国新闻业的总体个性特征是:新闻资产单一国家所有,新闻媒介在意识形态与产业双重基本属性中定位,在新闻与宣传两种主要功能中展开传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力量制约中发展运行^⑥。

有学者回顾中美报业在经济危机影响下遭受的损失,指出中国报业相比美国面临额外的体制矛盾危机,认为体制方面的问题,包括报业资本开放与市场重组没有完成,已成为其发展融资的瓶颈,而互联网等新媒体冲击又加强了报业发展的困境。对比美国报业应对危机的措施,这位学者指出了政府援助报业的合理性,提出了“救市”的具体政策建议,并希望报业自身抓紧改革^⑦。还有学者通过比较国内外广电规制及举措,指出放松节目制作市场准入、扶持节目制作企业发展、调整节目内容控制及运行机制三方面对我国的借鉴意义^⑧。

① 参见胡思勇:《社会阶层的演化与受众结构的变迁——党报内容结构调整的理由陈述》,《采写编》2009年第3期。

② 参见丁柏铨、徐徐:《论党报面临的新挑战及其战略选择》,《新闻传播》2009年第6期。

③ 参见姜凤羽:《党报改革创新坚持五项原则》,《记者摇篮》2009年第7期。

④ 参见杨继红:《非同寻常的八月》,《新闻大学》2009年冬季号。

⑤ 参见庄永志:《2003/2009:迟滞中前行》,《新闻大学》2009年冬季号。

⑥ 参见杨保军:《当代世界新闻业和中国新闻业总体特征分析》,《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⑦ 参见张向东:《中国报业:政府是否也该“救市”——当前报界的三重困境及其对策初探》,《新闻记者》2009年第1期。

⑧ 参见顾直凡:《制播分离的政府规制》,《广播电视传播研究》2009年第5期。

二、研究领域、代表性论文和主要观点

1. 新闻学研究

(1) 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

2009年,学者们对一些新闻理论问题有新的思考,对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导向失范表示关注,对新环境下的新闻失实有进一步的检讨,对新闻自由与行政司法的冲突有新的认识。

有学者把20世纪百年中国新闻理论发展脉络划分为三个阶段,其间分别以20年代和1949年为界。新闻学经历了政治工具、中国特色新闻理论、新闻传播观的演变,认为这百年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基本上只有一种研究模式,即“政治为体,新闻为用”^①。

有学者认为,新闻学理论应主要加强两个层面的研究,一是构成合理的新闻观体系,二是建设科学的新闻方法论框架。针对当前新闻实践的迫切需要,新闻观设计应该着重解决这样几个问题:新闻的物质基础与价值原点;新闻职业的权利与义务;新闻业与传媒业的区别与联系;新闻受众观念;新闻业的自律与他律^②。

研究者普遍认为目前新闻价值导向存在示范现象,而当前新闻价值选择则存在失范现象,主要是:极端的时效性,过分渲染的显著性,过于盲目的娱乐性。出现这些失范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由于受商业利益的影响,新闻的取向偏离整个信息受众的公共利益,使得新闻价值的公共性过于低俗、视角过分狭窄。新闻价值取向如何适应社会转型?首先,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注重新闻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其次,关注制度变迁。第三,关注建立长效的社会保障机制。第四,关注和维护社会公正。第五,积极关注公共风险^③。

有学者探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真实的新形态,认为这种新形态包括隐性真实、细节性真实、人性真实以及原生态性真实。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伦理不仅指事实的真与假问题,还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就是事实层面,本质上是一个“事实判断”,也即事实的真与假,它是一切新闻伦理的事实基础。第二个层面是“价值判断”问题,就是某种新闻行为在价值上的“应该”与“不应该”,某种新闻行为是否符合基本社会伦理准则的问题^④。

关于新闻自由与行政权力的冲突,有学者认为,这种冲突在当前表现为知情与反知情、表达参与与反表达参与、监督与反监督的冲突。这一冲突存在于现行的新闻管理政策之中,党和政府有关新闻自由与行政权力关系的政策是这一冲突的现有框架。在这一冲突框架下,新闻自由的力量受到了限制。法律将成为新闻自由与行政权力冲突的角力场,成为新闻自由与行政权力冲突的仲裁者和协调者^⑤。

有学者以博弈论为视角,讨论新闻自由与司法的关系,认为,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作为理性人必

① 参见李芳:《新闻理论研究的历史沿革——试探中国的新闻理论沿革》,《才智》2009年第28期。

② 参见祁涛:《试论作为新闻观与方法论的新闻学》,《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9期。

③ 参见石慧敏:《消费主义时代的新闻价值失范与重构》,《青年记者》2009年第4期;施文青:《社会转型期新闻价值取向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④ 参见王海琳:《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真实新形态》,《电影评介》2009年第10期;胡华涛:《新闻真实性原则的伦理悖论——以5.12汶川大地震新闻采访失范现象为例》,《传媒观察》2009年第5期。

⑤ 参见岳伍东:《新闻自由与行政权力的冲突及其框架》,《东南传播》2009年第5期。

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即追求最大限度的新闻自由与最大限度的司法独立。当二者分别进行理性选择并达成均衡时,其既未实现整体效能的最大化,也未实现各自利益的真正最大化。因此,应当建立相应制度,通过明确权利界限,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等方式,充分实现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以有效实现社会的民主与法治^①。

新闻泛娱乐化及其规避是学者们关心的又一个话题。有学者指出,所谓新闻泛娱乐化,就是将娱乐新闻的表现手段、形式和视角普遍地应用于各种新闻信息的传播中。内容上,从严肃的政治经济新闻中寻找并放大娱乐因素,淡化这类新闻的社会监督作用;表现手段上,利用娱乐新闻的报道技巧,以娱乐的态度和视角报道具有严肃和重要新闻价值的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片面追求吸引力,放弃新闻报道正确的价值取向,误导大众对新闻价值应有的认知。这种做法的后果便是新闻的泛娱乐化^②。研究者还指出泛娱乐化的危害:造成新闻传播手段和技巧的单一及新闻其他社会功能的萎缩;妨碍大众对社会变化理性和客观的理解;削弱媒体权威性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单纯对受众娱乐需求的满足必然造成此类信息的饱和;造成恒久新闻价值观的丧失等。有学者指出,泛娱乐化是娱乐的延伸,它打破了娱乐所追求的精神愉悦,突破了舆论环境对传媒的要求和限制,用媚俗甚至低俗的形态吸引受众,大力渲染性、暴力、凶杀、灾祸,是20世纪初黄色新闻潮在当代的转型^③。

过去的一年新闻学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或学科嫁接日趋成熟。在新闻叙事学研究中,有学者对20年来新闻叙事的范式转换特点作了新的概括,认为1990年以来的新闻叙事日益朝着故事化、模糊化、人本化的方向发展,这种范式的转换部分改变了新闻叙事的话语系统^④。另一位学者论述了新闻叙事范式的三个要素:主体性要素即新闻叙事的叙述者,结构性要素即新闻叙事模式,艺术性要素即新闻叙事时间。他认为,正是对这些要素的组合运用,才形成了不同的新闻叙事风格^⑤。

在新闻美学研究中,有学者重点探讨了新闻传播审美的构成。他认为新闻审美由三方面构成:以审美的眼光发现和捕捉新闻素材;以人文关怀作为素材展开的阐释立场;以受众的审美诉求进行新闻采编。他认为人文关怀是新闻审美传播的根本价值。他指出新闻传播倾注人文关怀,应有两个层次的考量:首先,应该关注人的基本物质需求;第二,尤其应该关注人的精神需求。说到底,我们强调人文关怀,是以带给受众真善美为己任,以教人奋进为目标的^⑥。

(2) 新闻史研究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闻史研究成果多,作者众。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及其实践机制形成和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又深化和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根本,以国富民强、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为价值依归,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思想路线,是开放大度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具有强烈的独特性、鲜明的时代感^⑦。

① 参见刘博达:《博弈论视角下的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公安研究》2009年第3期。

② 参见刘玮玮:《新闻泛娱乐化成因及不良影响》,《新闻传播》2009年第7期。

③ 参见房佳伟:《警惕新闻娱乐化过程中的泛娱乐化》,《才智》2009年第10期。

④ 参见林溪声:《故事化、模糊化、民本化:1990年代以来新闻叙事范式转换》,《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⑤ 参见黄晓军:《新闻叙事范式要素探析》,《孝感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⑥ 参见孙德宏:《略论新闻传播的审美构成》,《新闻记者》2009年第1期;参见孙德宏:《实现审美传播》,《新闻战线》2009年第10期。

⑦ 参见尹韵公:《新中国60年:当代中国传媒事业的特色与启示》,《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10期。

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新闻事业60年,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一个30年,是新中国宣告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转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一个30年,是拨乱反正,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30年,也是人民的新闻事业迅速发展的30年。后30年的中国新闻事业,各种新闻媒体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弘扬主旋律,歌颂人民群众在改革和建设中的奋斗业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①。

有学者指出,30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经历了一个转型时期。从研究内容上看,前期主要以史料整理为主,同时不断完善通史、断代史以及专门史的研究,并且取得了重大成果。新闻史研究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考证为主的研究方法;封闭单一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的突出影响。在当前研究趋势上,学界致力于研究方法的更新,在原有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出现了解释性研究方法、文化或社会分析批判方法,进一步恢复新闻史的历史真相,不断填补研究空白^②。

(3) 新闻实务研究

2009年新闻采访研究主要包括新时期新闻采访特点、采访过程及技巧方法、采访心理、采访权、隐性采访、采访伦理等。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新闻采访学呈现四个特点:由术到学,从操作技巧的介绍到新闻采访学的构建;新闻实践的内在要求推动研究重点渐次拓展;专著教材化,教材同质化;采访权与新闻采访史成为该领域正在或可能勃兴的研究热点^③。

有学者认为,我国有关新闻采访权的规范体系还没有建立,直接影响了新闻传媒的发展。新闻采访权的性质是当今新闻学界争论比较激烈的话题。有学者对采访权与索偿权进行分析,认为这两种权利都是受保护的权力,采访权的实现更多地依靠各方的合意,而索偿权的实现更多地靠权益的平衡和法律的支持。在行使采访权的时候,要更多地考虑发展的利益和个人的基本利益,而在行使索偿权的时候则要更多地关注媒体权益和公众利益^④。

对于采访中使用隐性采访方法如何规避侵权问题,有学者认为,隐性采访中的新闻侵权主要包括对被采访者的肖像权、名誉权、人格尊严、知情权和隐私权的侵犯。新闻记者在隐性采访中规避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有:公开场合、公众人物、公共利益,并应当遵循公共利益至上原则、客观记录原则、严格审查原则^⑤。

2009年的新闻写作研究不仅侧重从结构范式、手法技巧的角度进行创新研究,而且从思维方式、写作心理等层面逐渐将新闻写作研究提升到理论层面,对新媒体写作也有开拓性研究。有学者指出,新闻写作范式正在发生变化,表现为新闻报道的两大主要文体消息和通讯的标题传统形式趋于模糊,文体的文本格式边缘化,新闻文本的标题和格式都在创新,但创新不应丢弃新闻真实这个根本^⑥。有研究者认为,“故事化写作”对于增强新闻的可读性、娱乐性和市场效果具有明显作用,但是将故事化

① 参见方汉奇:《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新闻战线》2009年第10期。

② 参见张谦:《激活历史——评30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

③ 参见刘海贵:《论新时期我国新闻采访学研究的四大特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④ 参见杨彬权:《新闻采访权的性质及其法律规制》,《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12期;参见李衍玲:《新闻采访活动中的采访权与索偿权》,《新闻界》2009年第4期。

⑤ 参见武婷婷、赵士林:《隐性采访中的新闻侵权及其规避》,《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2期。

⑥ 参见钟克勋:《透视新闻宣传范式的变异》,《新闻界》2009年第4期。